

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以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为例

杨泽洲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然而，这一领域的知识生产范式长期受到殖民话语和西方学术中心的影响。中国的研究声音虽在逐步增强，但在研究去殖民以及范式重建的任务中仍显薄弱，无法充分发挥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亚洲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基于此，通过对尼泊尔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本文提出“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旨在通过引入关系主义的分析思维，将研究重心从静态的“特征区域”转向动态的互动过程，强调历史与现实、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多层次交织与联系。中国—尼泊尔研究范式试图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中揭示区域主体性如何在跨境实践中生成并重塑，并进一步将中尼关系的经验延展至喜马拉雅区域、亚洲及全球南方。在宏观层面，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应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研究议题应关注尼泊尔、喜马拉雅区域以及其他亚洲地区和成员间的互动与往来；微观层面的研究方法与议题上，应注重时空化的情境分析，关注跨境互动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突破以国家为单位的单向度研究路径，逐步形成从国家互动、区域联系到全球南方动态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自主知识体系，助力双边、周边、亚洲和全球南方等各维度的命运共同体构建。

关键词：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命运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亚际互鉴；区域国别研究

收稿日期：2025—03—23

作者简介：杨泽洲（1992—），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南亚关系、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等。

随着“区域国别学”学科的设立与发展，“如何开展自主的知识生产与理论构建”已成为学界共同关切。关于区域国别学自主性的讨论中，不少学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根本困境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将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非西方经验视为附庸或注脚，用以验证西方理论的合法性与普适性。正如梁永佳所言：“一个个生发于欧美的理论成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学人追捧的对象。大家从本国情况出发‘驳斥’那些理论的同时，很少在彼此之间做有效的沟通，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全球化以来，全球学术分工尤为如此。‘西方谈普遍，非西方谈特殊’，各国学者竞相论证自己的老家属于西方理论不能包括的例外。”^①

因此，打破这种被动依附的研究框架，改变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状，构建能够体现中国主体性特质的知识范式^②，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③，已成为实现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

喜马拉雅区域，因其在自然、民族与文明交汇上的高度复合性，形成了多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是理解亚洲区域互动与文明流动不可或缺的关键场域。此外，该地区承接“一带一路”倡议中多个项目落地，并与其他次区域相连，包含“孟中印缅经济走廊”^④与“中尼印经济走廊”^⑤核心通道等的建设，因此相关研究为中国周边外交、区域治理和全球南方发展提供重要经验。该区域还涉及包含气候变化、冰川退化及水资源分配等跨区域甚至全球关切的议题，对这些议题的研究与参与能从全球、地区、双边和功能议

^① 梁永佳：《南亚研究的区域视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08页。

^② 赵可金、尹一凡：《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第75页。

^③ 许勤华、柳震：《区域国别学的自主性构建：以英美俄早期区域国别研究为例》，《中国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108页。

^④ 参见：景丽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外交》，《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姚遥、贺先青：《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8期。

^⑤ 参见：林民旺：《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战略价值及建设思路》，《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孙建中：《构建“中尼印经济走廊”面临的困难、挑战及对策思考》，《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黄正多、徐家宜：《错误知觉下印度对中尼印经济走廊的融入困境分析》，《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

题等多领域共同发力，^①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遗憾的是，受限于在去殖民以及范式重建双重任务上的有限进展，当下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自主体系建设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潜力仍然没有被彻底解放出来。2023年7月25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有尼泊尔研究这门学科吗？”（Is there a discipline called Nepali Studies?）的圆桌讨论。^② 此次活动意在促使学界重新思考尼泊尔研究的历史发展、学科边界与研究路径。虽然讨论未得出明确结论，但此探讨过程本身已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该问题。正如尼泊尔学者、文学家阿比·苏贝迪（Abhi Subedi）所言，对于不同背景和经历的研究者而言，尼泊尔研究的内涵与意义各异，而对这些差异进行反思与辩论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该学科内涵和外延的重塑。^③

现代意义上的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起源于殖民南亚的英国人，并在此后数百年间由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发扬壮大。20世纪后期，一些位于亚洲但同样参与全球北方知识体系建设的国家（如日本和新加坡）的学者也加入了这一学术体系的建构。他们共同建立起一套与殖民统治、冷战格局和全球资本流动紧密相关，并涵盖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与文化消费等各领域的区域研究体系。

从殖民时期的东方学到20世纪中叶以来的人类学研究，欧美学界一直是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主力军，相关理论、研究关切及方法奠定了此领域研究的基本面貌。然而，欧美学界天然带有的东方主义凝视以及内化的殖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将该区域异化为“化石”“香格里拉”以及“交界地”三位一体^④的研究客体，自身主体被削弱及误读。值得注意的是，以欧美学界为主的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近年来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趋势。这一变化并非临时出现，而是结构

① 薛力、苗蓓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联系与外交实践》，《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2期，第9页。

② 2023年7月25日，为纪念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尼泊尔与喜马拉雅研究教授迈克·赫特（Michael Hutt）退休，当年的“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加德满都年会”（The Annual Kathmandu Conference on Nepal and Himalaya）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办了一场会前讨论会。讨论聚焦尼泊尔研究学科的发展与未来，来自尼泊尔、英国、印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九位学者发表了演讲，其余数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与会者旁听了会议。

③ “Of Nepal Studies”, *The Kathmandu Post*, July 28, 2023, <https://kathmandupost.com/columns/2023/07/28/nepal-studies-has-been-around>.

④ Mary Des Chene, “Is Nepal in South Asia? The Condition of Non-postcoloniality”, *Studies in Nepali History and Society*, Vol. 12, 2007, p. 218.

性的，历时已久。随着大英帝国在南亚的直接殖民统治结束，以及冷战格局瓦解，欧美各国逐渐失去了对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动机与支持，结果之一就是相关区域研究机构被裁撤，研究经费被缩减，许多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被分散在诸如人类学、发展学、地理学等具体学科之下，从而削弱了区域研究的自主性。此外，全球化流动的加速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尼泊尔东方主义的神秘化想象，虽然起到了批判性祛魅作用，但也削减了欧美学界长期以来从事相关研究的原动力。在此背景下，此圆桌讨论可被视为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尼泊尔研究学界的一次“小型自救”尝试，其效果如何，需要时间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上述结构性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西方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复兴与发展仍将面临严峻挑战。

以彼为鉴，此次以欧美学术界为主导的讨论对中国的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一方面，它揭示了欧美在该区域研究中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与不可持续性，为中国在推进相关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时拉响了警报；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一个外部参照，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如何避免重蹈旧有知识生产的覆辙。如何处理好西方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发展所揭示的规律，如何处理好中国本土认识与西方知识生产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中国、区域以及世界的关系？^① 着眼于这些问题，本文可被视作是对此次圆桌讨论的场外呼应。

中国对该地区的记载与研究源远流长。以尼泊尔为例，从古至今，往来于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古代“五印度”^②）的僧侣、使节、商人和艺术家，留下了大量有关尼泊尔的文字记载。这些历史材料对于当代学者重构尼泊尔历史及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的联系，具有重要价值，至今仍是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不可替代的史料来源。

然而，中国现代的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西方殖民性知识生产框架。相关研究与学科建设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欧洲的知识积累与人才培养，但同时也受到其理论与方法论的制约，导致在理论自主与本土化方面存在不足。例如，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便试图开展尼泊尔研究。但当时的相关知识生产大多

^① 赵可金：《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与方法》，《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2期，第142页。

^② 薛克翘：《从法显的“五天竺”到玄奘的“五印度”》，《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以边疆安全和现代化发展等具有较强现实导向的议题为切入点，缺乏对对象国自身的关注以及系统性研究。此外，研究高度依赖西方既有的文献材料，不仅将西方构建出的尼泊尔视为客观存在，更信其背后的殖民逻辑。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在制度建设、机构发展、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等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及至当下，已经取得多领域、交叉学科以及高影响力的研究成果。^①然而，相关研究依然存在着现实问题导向较强、依赖西方国际关系及国际政治理论、缺乏中观和微观层面研究、议题和视角相对局限以及基础研究和田野调查不足等问题。此外，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在中国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研究中仍处于边缘位置，^②在国际层面上，西方学界也依然掌握着该领域的主要资料与话语主导权。

综上所述，数百年来关于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学术成果，形成了丰富的文献资源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传统，但是发展至今，传统的研究理念、对象以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构建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作用。如何去殖民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范式是中国喜马拉雅区域研究面临的双重任务。对相关领域去殖民的反思，是对以往依赖西方学术话语与知识框架的批判与超越，旨在揭示其中潜藏的殖民性遗产以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反思的基础上，应进一步通过以本土问题意识为出发点、立足跨区域历史和当下的互动，提出更具主体性与解释力的知识生产范式，从而实现相关领域自主化建设，并推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本文将此双重任务的探索置于中国和尼泊尔的互动关系中，将两者间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作为去殖民知识生产以及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场域。尼泊尔地处中国与印度之间，因长期扮演跨区域交流枢纽和地缘政治缓冲地的角色，在喜马拉雅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外，尼泊尔丰富的宗教和文化资源使其在喜马拉雅区域的学术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际学界常将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并列称呼，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多年来，尼泊尔一直是包括人类学在内诸多研究领

^① 邱永辉、曾浩：《21世纪以来中国的南亚研究——邱永辉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5年第3期，第136页。

^② 同上，第137页。

域的重镇，尼泊尔研究对宗教、种姓、阶级、女性主义以及跨文化交流等议题提供了许多理论和概念参考。^①当前，尼泊尔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热点。^②在继续积累更全面深入准确的尼泊尔国别基础知识外，研究尼泊尔发展也应审视其殖民性，突破传统研究范式，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的自主知识生产主张的交流互鉴、和而不同的使命高度，^③重新思考中国、尼泊尔、亚洲和世界的连接性关系。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主旨所在。

一、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提出与意义

研究范式是指导学术研究的一整套基本信念、理论框架、研究逻辑、方法体系与价值取向，其规范着“研究什么”“怎么认识”“如何研究”以及“何为有效研究”等一系列研究的基本问题。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首次提出此概念，认为研究范式是“在一段时间内，为特定的实践群体提供模板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普世化的科学成就”^④。在库恩的基础上，之后的学者对研究范式的定义进一步系统化。例如，埃贡·古贝（Egon Guba）与伊冯娜·林肯（Yvonna Lincoln）将其定义为“一种基本的信念体系或世界观，它不仅决定研究者采用何种方法，更深刻地影响其对世界本质（本体论）以及知识获取方式（认识论）的根本理解”^⑤。对于研究范式本身的讨论不是本文的重点，此处不再赘述。一般而言，本体论、

^① 李静玮：《尼泊尔人类学研究的东方主义范式——兼论人类学知识本土化之必要性》，《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王启龙、赵勇：《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02页。

^③ 薛力、苗蓓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联系与外交实践》，《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2期，第5页。

^④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 111.

^⑤ Egon Guba and Yvonna Lincoln,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 105.

认识论和方法论被认为是研究范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中本体论关注研究者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认识论则与知识获取的途径有关，而方法论则是关于获取与分析知识的具体方法。

（一）现有研究范式的瓶颈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区域研究自然也有其研究范式。大体上，在传统区域研究中，对于区域的认知与考察通常被限定在特定封闭的边界之内。这种“特征区域”^①代表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本体论，旨在唤起人们对一个因其自然与文化特性而具有持久独特性和同质性的空间区块的想象。此类区域被假定为存在于“外在”世界的实体，并基于一种先验假设：世界本就按照这种方式被划分。^②在这一框架中，特定区域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存在，独立于其内外部的社会历史过程，强调其固有且排他的特征，并将这些特征标记为“自古以来就已存在”^③。与此相伴的是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即认为知识通过经验验证获得。因此，研究者的方法便是收集信息和数据，以建立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关于这些空间上被固定的实体的知识。^④在这种思路中，观察者的立场被假定为无害且天真，^⑤所收集的资料被视为在观察者全面理解与能力基础上所获得的准确且可信的记录。这类知识往往被当作对某一地区在“外来者”介入之前原始状态的真实再现。这种由民族中心主义、本质主义与经验主义所塑造，并常以“发现未被现代发展所触及之地”的叙述所包装的话语，想必对任何关注尼泊尔或其他喜马拉雅地区的人们而言都是耳熟能详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类知识生产及其对尼泊尔的相关描绘，实际上构成了殖民扩张以及不对称全球化的一部分，其传播路径从西方大都会“中心”向喜马拉雅“边缘”延伸。

① Arjun Appadurai, “Grassroots Globalisation and Research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 Vol. 12, 2000, p. 6.

② John Agnew, “Regions on the Mind does not Equal Regions of the Min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3, 1999, p. 92.

③ Thon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12.

④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 “Introduc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rea Studies and the Mobility Turn”, in K. Mielke and A. K. Hornidge, eds., *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6.

⑤ Mary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81.

虽然发展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条件与文化语境之下，中国的现代尼泊尔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亦运用了这一传统区域研究范式。无论是 20 世纪中期基于友好外交叙事的文化交流研究，还是后冷战时期转向地缘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分析，许多研究都将尼泊尔视作一个相对静止的“他者空间”，认识上以了解其宏观国情为主要目标，以服务国家利益、安全或政策制定为导向，尼泊尔常被简化为中国地缘政治战略中的变量，国家的复杂性、多元性与历史主动性遭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因此，本土时空中的经验常被技术性、数据化的表述所替代，区域也是一个被观察、被测量、被代表的“对象化”空间。

客观上，传统尼泊尔研究的范式在特定的条件与需求之下承担了增进对尼泊尔基本了解的使命，但是在促进构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却展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文明相互影响、彼此滋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之一，因此，应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在差异的前提下建立起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并取得共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①传统的尼泊尔和喜马拉雅研究范式在提供构建基本知识之余，无法呼应这种强调差异性和对话性的知识交流要求。这种以自身经验和价值体系为出发点的知识生产方式，正是中国在建设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时既需参照又必须避免的路径。姜景奎教授指出，“拥有中国视域和对方视角应成为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②，“以我为主”的知识生产并不意味着以中国中心简单替代西方中心^③。相反，应在立足中国经验、实践与本土概念的基础上，对这些经验与概念的主体性进行持续的历史性与空间性反思，实现“以中国为观照”^④，并在与全球学术界的互动中形成开放而自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领域，尽管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尝试重构知识体系，揭示其与殖民学术谱系的关联，但多停留于对现有知识生产体系殖民性的批判层面，尚未形成能够替

^① 博科娃、王逸舟、董强：《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5年6月10日，第9版。

^② 姜景奎：《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刍议》，《南亚学》，2023年第1辑，第21页。

^③ 王义桅：《主场区域国别研究：构建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呼唤》，《天府新论》，2025年第2期，第12页。

^④ 殷之光：《时空维度下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一个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初步思考》，《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5期，第24页。

代的自主认知与研究范式。

（二）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界定

本文试图探索“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突破传统研究方式将研究对象固态化、限定化以及客体化的倾向，呼应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差异和对话的基本要求，推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范式革新以及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从本体论上而言，此范式的重点不是尼泊尔或尼泊尔研究本身，不在于单纯的平行比较，也不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必然连接，而是尝试将两国的互动性关系作为认知与研究的主轴，并将此置于中尼两国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经济与政治制度等方面结构性差异之中进行对话性考察。在认识论层面，此范式采取辩证态度来看待这些交流过程中的差异，认为尽管这些差异如同“水与泥”^①，在跨文化交往中构成难以消弭的障碍，但同时也在跨文化交往过程中生成间隙地带，为互动提供了动力且塑造了主体间性的空间。方法论上，该范式不仅强调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整合，更关注多模态（multimodal）知识生产的路径，“致力于探索人类经验中多样的认识路径，并不断推陈出新的研究工具、实践及概念，以传播和深化对这些经验的理解”^②。

总结来说，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力图突破传统区域研究以“特征区域”为基本预设的研究路径，“引入关系主义理论思维”^③，将研究重点导向不同时空条件下区域生产及变迁的互动与流动中。然而，其并不试图构建一个真空的理想化交流场域，也不是要机械地记录两国互动中的人、事与物，而是尝试将中尼关系的主体性生成与变迁置于具体的时空情境中加以考察，并在微观层面将其与具体的行动者以及相应的行为结合。此在具体情境互动中生成的主体性并不独属于任一参与者，而如棱镜般呈现纷繁的多面向，其折射出的复杂性不仅能够使人们认识到不同行动者的动机、行为以及各自之间的权力关

① 姜景奎：《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刍议》，《南亚学》，2023年1辑，第10页。

② Mark Westmoreland, “Multimodality: Reshaping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51, 2022, p. 177.

③ 贾文山、刘长宇：《新亚洲学论纲：文明型亚洲研究的构建》，《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7期，第3页。

系，更能超脱特定的时空条件，将此关系与其他关系网络相链接。因此，这不仅有助于揭示中尼关系在不同纬度的具体表现以及相关条件，也能为构建自主的中国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三）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意义

作为参与构建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从而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研究范式，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意义在于能够将抽象的宏观战略目标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域实践路径，并从具体的时空条件出发，为强调差异和对话的文明互鉴提供在地理论支持。首先，对中尼关系的考察可以为理论化差异性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文明互鉴中的核心地位提供具体的经验基础。这里将以中尼两国在20世纪初交往过程中所展现的认知不对称为例子，展示跨文化交流复杂性如何可以作为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方法的认识基础。20世纪初期的中尼交往呈现出显著的认知不对称性。尼泊尔统治者推行的“选择性排外”（Selective Exclusion），^①实质是通过控制跨境流动来维系统治特权——仅允许对贵族阶层有利的外来人与物入境。此外，尼泊尔还拥有独特的宗教地理观：将加德满都谷地神圣化为印度教文明的中心场域，在此认知框架下，中尼关系并非基于现实政治的权力博弈，而是被纳入印度教宇宙论的诠释体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彼时中国对尼泊尔的认知长期处于双重范式并存的混沌状态：一方面延续朝贡体系的遗产视尼泊尔为藩属，另一方面又在现代国际框架下承认尼泊尔主权国家地位。这种认知双重性导致外交实践中出现范式混用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两国之间的交往。然而，这种“自说自话”的现象，似乎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想象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并巩固之前，跨亚洲知识生产的替代性图景。产生这种认知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中国与尼泊尔在截然不同的语境乃至世界观下相互想象，但这种差异并未阻碍双方的交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动。这一现象可被理解为跨喜马拉雅区域复杂性在知识生产中的积极作用——正是这种多重差异与张力，为跨文化交往注入了新

^① Mark Liechty, “Selective Exclusion: Foreigners, Foreign Goods, and Foreignness in Modern Nepali History”, *Studies in Nepali History and Society*, Vol. 2, No. 1, 1997, p. 10.

的动力与创造性空间。

在阿克塞尔·米凯尔斯（Axel Michaels）的最新研究中，他通过对18世纪末以来中尼朝贡关系的解构性分析，深化了跨文化复杂性的理论阐释。^①尽管学界对廓尔喀王国与清王朝的边界争端及后续发展已有充分讨论，^②但米凯尔斯的研究另辟蹊径：基于尼泊尔语原始档案的文本细读，揭示出中尼双方战后条约存在着根本性的认知分野——这种差异非但未阻碍两国交往，反而成为维系百年互动的关系弹性机制。研究指出，清政府将尼泊尔定期遣使视为五年一贡的藩属义务，而尼方文献则将“朝贡”定位为例行性物产馈赠，使团实质承担着跨境商贸职能。米凯尔斯强调，这种认知鸿沟不能简单归因于语言转译偏差，而是因为喜马拉雅南北两侧迥异的世界观范式与权力结构逻辑。尽管清政府在朝贡体系中为尼泊尔保留着特殊地位，而尼泊尔统治精英虽否认臣属关系，却策略性接受清朝册封并维持定期使团往来。正是这种模糊空间，使得双方得以规避认知冲突，在各自的话语体系内构建互利交往模式。这种基于差弘认知的弹性互动机制，恰是跨喜马拉雅文明互鉴的历史经验精髓。

米凯尔斯的研究洞见揭示了跨喜马拉雅交往的本质特征：复杂性实为多重权力网络交织的产物。这种复杂性在接触地带的边界实践中尤为显著——清廷的朝贡想象、西藏地方政府的治理、廓尔喀王国的地缘策略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在此形成动态张力。不同主体往往通过各自的认知透镜，对同一地理空间进行差异化的意义赋予。这种多元认知图式的并存，表明在研究喜马拉雅交往史时，必须突破单一主体的视角，在历史语境中辩证地解构主体性的生成机制。基于这一理论脉络，面向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若要区别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宏大区域知识生产，必须关注并尊重差异性与复杂性，而非以“中国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框架简单取代现有体系。正如吴小安所强调的，应“将全球视域与亚

^① Axel Michaels, *Nepal-A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24; Axel Michaels and Xu Yunheng, *Who Won the Sino-Nepalese War of 1791-92? A Study in Transcultural Complexity*, Heidelberg: Heidelberg University Publishing, forthcoming (此书尚未出版，已得到作者引用许可)。

^② 参见：王艳芬：《中尼第二次廓尔喀战争及其影响》，《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穆阿妮：《刍议乾隆年间清廷对中尼边界的厘定及其管理》，《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房建昌：《廓尔喀（尼泊尔）朝贡清廷考》，《西藏研究》，2013年第1期。

洲研究脉络相提并论，强调历史性的与比较性的透视”^①。

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首要工作是揭示传统研究范式中深嵌的殖民性。因此，要梳理殖民扩张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背景下相关知识生产的形塑过程，以及后殖民时代殖民残留^②是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亚洲邻里之间的认识与理解。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试图突破固化的区域概念，构建“时空性的结构场域，其中地方性与全球性、多重时间维度与空间尺度彼此交织；它不仅容纳了人类的迁徙流动，也开放于跨地方与跨区域的社会实践与知识生产”^③，以此来呼应多时空情境及本土方法的研究，挑战西方中心的区域研究知识霸权。

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并不止步于对殖民性的反思，还力求立足中国经验与实践，带来研究范式上的革新与自由，助力中尼双边、亚洲以及全球南方等不同层级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双边关系层面而言，2019 年，中尼两国已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正在积极共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尼命运共同体。^④该范式以差异性为基础的对话关系为根本，充分展现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基础的求同存异的理念。在双边关系之上，还可以助力亚洲文明互鉴。长期以来，作为重要知识生产场域的亚洲的主体性被西方生产的各类地理概念所宰制，不仅影响了亚洲成员的自我想象，阻碍了彼此之间的直接参照，^⑤而且限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地实践。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强调交往的过程与情境，不仅有助于打破国际交流中“大国一小国”的二元对立话语，突破学科预设与固有情境，^⑥而且能够为中国在其他类似区域与

^① 吴小安：《中国区域国别学：全球视域与亚洲研究脉络下的理论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第 1 页。

^② Ann Stoler, *Duress: Imperial Durabilities in Our Tim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6-7.

^③ Vincent Houben, Ramon Guillermo and Elisio Macamo, “New Area Studies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The Way Ahead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for Asian Studies*, Vol. 51, 2020, p. 53.

^④ 驻尼泊尔大使馆：《共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尼命运共同体——驻尼泊尔大使陈松抵达尼履行新机场讲话全文》，外交部网站，2023 年 1 月 8 日，https://www.mfa.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1206x2_676832/202302/t20230203_11019181.shtml。

^⑤ Nile Green, “The Idea of ‘Asia’ and Its Alternativ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30, No. 2, 2025, p. 664.

^⑥ Adhira Mangalagiri and Tansen Sen, “Introduction: Methods in China-India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9, No. 1, 2022, p. 169.

国家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可借鉴的“中国经验”，其中之一便是重新思考中国、亚洲各成员以及世界的联系，从而实现“亚际互鉴”（Inter-Asia Referencing），即通过亚洲各主体之间的互为参照，达成反思与自我反思。参考陈光兴提出“以亚洲为方法”的经典论述，主张将亚洲作为想象性锚点，使不同社会在相互参照中完成主体性重构，进而调动多元历史经验，建构突破西方认识论霸权的替代性认知框架。^①正是亚洲各主体在历史轨迹、地缘位置与文化基因上的异质性，构成了理解跨区域交往复杂性的关键维度，也为解析主体性实践提供了动态的场域。在更大的范围内，其对亚际互鉴的促进，亦可助力在文化交流上加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互鉴与开放包容。^②

二、尼泊尔研究知识生产的谱系梳理

广义上的尼泊尔研究并非仅为现代区域研究的产物。若将历史上诸如中文等亚洲本土文献中关于这片土地的记载视为尼泊尔研究的雏形，那么该领域的历史可上溯数千年之久。通常意义上，现代尼泊尔研究的开端与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扩张相联系。本节将尼泊尔研究的知识生产脉络划分为前现代、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以及新时代反思期四个阶段，通过西方与中国视角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梳理，指出作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并致力于推动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代尼泊尔研究，应当重视关系性视角，关注两国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互动与共建，从而充分释放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在去殖民化、研究范式重构以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潜在作用。

（一）前现代尼泊尔相关知识生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对尼泊尔留下文献记录的国家。历史上，通过

^① Chen Kuang-Hsing,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3-14.

^② 夏立新、云新雷：《构建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略》，《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5期，第12页。

宗教、外交、商贸与艺术等渠道，中尼两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双边交流。例如，中国古代僧人法显及玄奘对包括现代尼泊尔在内的南亚次大陆部分地区的访问，不仅被誉为中尼交往的典范，更是亚际互鉴的重要历史实例。对古代中国僧人而言，这片土地是佛教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踏足亲历此地能回应他们在修法过程中所面对的思索与精神焦虑。^①这种以本土现实关切为导向的互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历史上中国对尼泊尔的认知与书写。这种基于区域本土关切的交流与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历史雏形，对当代中国探索尼泊尔及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具有参照意义的可替代性经验。遗憾的是，这些历史交往的记录并未在前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中发展为关于尼泊尔或喜马拉雅区域的系统性知识体系。19世纪末期，廓尔喀人统治下的尼泊尔王国与中国西藏爆发了两次战争。战争所需要的情报工作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对尼泊尔的系统性知识生产。除直接记录战争经过和相关情报的《钦定巴布勒纪略》和《钦定廓尔喀纪略》外，尼泊尔还被收录于不同版本的《皇清职贡图》。

西方对尼泊尔的最早探索可追溯至17世纪。彼时欧洲的耶稣会士在跨越喜马拉雅的行程中留下了些许关于尼泊尔的观察与记录。这些记述若以当代标准衡量，充满了赤裸的东方主义式偏见与歧视。1662年，耶稣会士约翰·格鲁伯(Johann Grueber)自北京经尼泊尔返欧途中，曾对当地女性做出污名化描绘：“其丑陋之貌，几乎更似魔鬼而非人类……并且她们身上涂满了油，肮脏不堪，使人几乎无法将其视为人，而只能视为女巫。”^②这一带有贬抑意味的叙述反映了早期欧洲旅行者在观察他者时所持的文化优越感与排他性视角。

(二) 殖民知识生产体系下尼泊尔研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尼泊尔和喜马拉雅研究由英国殖民者所肇始。在殖民时期及其延续阶段，传教士、探险者、外交官、东方学者、人类学家以及嬉皮旅行者参与了对尼泊尔的材料收集、分类与诠释。他们以

^① Tansen Sen, *Buddhism, Diplomacy and Trade: 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② Axel Michaels, “Nepal in the World”, *South Asia Institute Papers*, 2018, p. 3.

东方主义视角，认为尼泊尔是一个遥远的、在历史与地理上均独立于现代文明、位于“现代之外”的空间。

17世纪之后的数百年间，尼泊尔的大门被更多欧洲人所打开。他们以中立、理性与科学为名，对尼泊尔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调查。他们所收集的材料与编撰的研究报告，涵盖了尼泊尔地理、地质、动植物、经济、居民及其风俗、历史与政治制度等方面，其中有些至今仍对当代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被誉为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的布赖恩·霍奇森（Brian Hodgson），是19世纪初驻加德满都的英国驻地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对尼泊尔佛教、语言学与动植物学等领域做了深入研究，不少成果至今仍是尼泊尔研究的重要材料。^①法国印度学泰斗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通过梳理中文和藏文文献发掘出的有关尼泊尔历史的记载，为后世研究尼泊尔历史及其与周边国家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②

然而，直到20世纪中叶，这些关于尼泊尔历史、宗教、社会与人种的研究并未系统化为独立学科，而是更多作为藏学^③或印度学的旁支而延展出来，且带有浓厚的殖民性。从研究者构成来看，许多早期从事尼泊尔研究的人员本身是英国殖民官员。例如，前述的霍奇森毕业于专为英国殖民地培养文职人员的海雷柏瑞学院（Haileybury College），精通孟加拉语、波斯语、梵文、尼泊尔语与尼瓦尔语。在尼泊尔尚未全面对外开放的时期，他利用职务便利搜集了大量珍贵资料。^④像霍奇森这样的殖民官员能够长期垄断尼泊尔知识生产的渠道，与英国对尼泊尔的“间接殖民”关系密切相关。虽然尼泊尔与印度不同，未曾遭受英国直接殖民统治，但在1816年，英国通过战争迫使尼泊尔签订《苏高里条约》（Treaty of Sugauli），不仅要求其割地与提供兵源，还获得了在加德满都常驻英国驻地官的特权。这一特殊安排为英国在尼泊尔研究领域的长期垄断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特殊殖民纽

① David Waterhouse ed., *The Origins of Himalayan Studies: Brian Houghton Hodgson in Nepal and Darjeeling*, London: Routledge, 2004.

② Sylvain Lévi, *The Mission of Wang Hiuen-Ts'e in India*, Calcutta: Indian Geographic Society, 1967; Sylvain Lévi, “Nepal (continue): ‘Chinese and Tibetan Document’”, *Ancient Nepal*, No. 14, 1989, p. 63.

③ 格藏才让：《喜马拉雅区域的人类学学术史研究——以欧美人类学著作为中心》，《西藏研究》，2024年第2期，第135页。

④ 李静玮：《南亚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与演变》，《民族研究》，2023年第3期，第74页。

带所催生的尼泊尔知识生产，既直接服务于英国在尼泊尔的殖民体系，为统治者提供情报与信息，也影响了尼泊尔精英的自我认知。在这种知识流通中，尼泊尔的统治者与知识分子在“书写自身”与“书写欧洲”的过程中，往往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为参照想象现代国家的形态。^①因此，根植于英国南亚殖民统治大框架下的尼泊尔研究，在尚未形成系统学科之前便已丧失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它不仅承担着为殖民体系提供学术与政策信息的职能，^②更长期被卷入以殖民者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工作机制与欧洲学科理论体系之中，^③从而导致尼泊尔及其研究主体性深陷于欧洲话语的宰制之下。

中国现代的尼泊尔研究发展于 20 世纪初期，也深受殖民知识生产体系限制。首先，欧洲语言，尤其是英文资料几乎垄断了彼时中国知识分子了解尼泊尔的途径。历史上中国对尼泊尔的记载几乎无人问津，直到 1946 年地质学家章熙林出版《尼泊尔新志》^④，这些基于本土材料的历史交往与记载才首次被中国学者系统化，并被明确构想成两国现代国家关系的历史基础。在更深层次，欧洲中心主义的国家观、现代观以及发展观几乎从意识形态上宰制着中国官方以及知识分子看待分析尼泊尔的视角，结果便是他们的研究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度纠结于清乾隆以来中尼间的宗藩关系；二是以尼泊尔为参照，探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话语。这两种倾向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尼泊尔与中国各自的主体性，一直到政治意义上的后殖民时期才有所改善。

（三）后殖民^⑤时期尼泊尔研究发展

虽然“现代尼泊尔研究”的确切界定尚无共识，但 20 世纪 50 年代可视为其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的知识生产格局主要受到两股力量的影响。1951 年，随着英国殖民者撤离南亚，统治尼泊尔逾百年的拉纳（Rana）首相家族失去了关键的外部支撑。在亚洲民

^① Pushpa Raj Acharya, “The Nation-State of Nepal in Nepali and Anglophone Novel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hD. Dissertation, 2022.

^② 李伟华：《英国的海外殖民与东方学研究——以 1827—1923 年〈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印度学研究成果为中心》，《海洋史研究》，2022 年第 18 辑，第 378 页。

^③ 李静玮：《南亚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与演变》，《民族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75 页。

^④ 章熙林：《尼泊尔新志》，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

^⑤ 文章此处仅强调狭义的后殖民概念。

族独立浪潮和印度独立运动的双重影响下，由尼泊尔大会党（Nepali Congress）领导的政治力量推翻了拉纳政权，尼泊尔王室重新掌权。政局变化后，尼泊尔打开国门，作为后殖民独立民族国家开始更多地与国际社会接触，以寻求政治承认与外交支持。1955年，尼泊尔正式加入联合国，进一步提升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这一政治转型直接在国际层面影响了尼泊尔研究的发展路径。地缘政治变化层面上，从英国殖民体系中逐渐脱离出来之后，尼泊尔在国际社会上呈现出一个“新”国家的形象，在冷战背景下处于敏感战略区的喜马拉雅地区，表现得较为开放和中立。尼泊尔政府欢迎各类西方组织在领土内开展学术以及其他目的的调研工作，并给予他们较大的工作自由。这种现实的“引力”与西方百余年来对此区域的东方主义狂热想象以及彼时欧美人类学对于探索“尚未被现代性触及”社会的研究传统不谋而合，共同促成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尼泊尔学术研究几乎被西方人类学家主导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尼泊尔研究的学科基础。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海门道夫（Christoph von Fürer-Haimendorf）为代表的欧美人类学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塑造了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人类学的基本研究面貌。^①这类研究多集中于喜马拉雅及其他山地地区的所谓“原始”部落，关注种族、种姓、家庭、族群、婚姻、经济、宗教与仪式等这些西方人类学的核心关切议题。这些研究试图构建一个不受现代民族国家影响，在地理与文化上均保持“永恒不变”的交融图景。^②

这种浪漫化倾向在尼泊尔研究中长期存在。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费舍（James Fisher）曾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其辩护，声称原因在于尼泊尔保留了一些西方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丧失的东西，而他们来到这里，

① 参见：赵勇：《海门道夫的喜马拉雅山地族群调查与研究》，《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赵勇：《海门道夫关于珞巴族阿帕塔尼人研究的价值分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赵勇：《海门道夫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及其评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赵勇：《喜马拉雅族群那加人研究及其价值——以海门道夫康亚克那加人研究为例》，《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王启龙、赵勇：《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沈海梅：《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刘秧、徐君：《从“雪的住所”到“拉链缝合区域”：喜马拉雅地理概念、区域范围与人文特点探讨》，《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

② 杨泽洲：《中国的涉尼泊尔网络游记：权力叙事及多模态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南亚学》，2024年第5辑；李静玮：《尼泊尔人类学研究的东方主义范式——兼论人类学知识本土化之必要性》，《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正是为了寻找这些东西。^①或许对于费舍而言，这一表述并非纯粹的策略性辩解，而是其真实感受的表达。然而，这一论述有意或无意地将尼泊尔与西方置于发展与现代化的线性谱系两端。本质上，这种立场违背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原则，即社会与文化不应被置于进化论式的等级体系中进行比较与排序。^②这种叙事不仅将尼泊尔文化描绘为封闭、整体性的社会世界，还在学术话语中强化了其“凝固化”的刻板印象，从而在另一种形式上重申了虚构文学中“香格里拉”式的浪漫化想象。

当西方人类学家试图在尼泊尔这片土地上寻找并构建其所想象的香格里拉之时，中国的尼泊尔研究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1955年，中国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亚非民族独立与反殖民运动的国际背景下，新中国早期的尼泊尔研究以“友谊”为主旨，将两国历史关系置于反帝反殖的宏大叙事之中。例如，1963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美丽的山国尼泊尔》的文章，通过介绍尼泊尔国情与最新发展，重申中尼平等合作关系。文章从尼泊尔的自然风光、资源禀赋与民众品质切入，引出尼泊尔人民为反帝斗争与捍卫国家主权所作的努力，特别强调公路建设作为打破帝国主义与扩张主义长期封锁的重要举措。在叙述尼泊尔和平中立外交政策及其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后，文章以中尼睦邻友好关系作结：“中尼两国是友好和睦的邻邦，两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特别是近几年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指导下，两国领导人进行了相互访问；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签订了中尼边界条约……中尼两国的友好关系，在今后的年月里，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尼两国人民深厚友情之花将越开越鲜艳。”^③

这种“友谊”话语并非单向表达，而是以公开互动的形式存在。例如，195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尼泊尔人民向中国人民问好》的文章，全文为时任尼泊尔—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普尔纳·巴哈杜尔（Purna Bahadur）的公开信。同样，这封信将中尼友谊置于

^① James Fisher, “‘Romanticism’ and ‘Development’ in Nepalese Anthropology”, *Occasional Papers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 1, 1987, p. 35.

^② Michael Brown, “Cultural Relativism 2.0”,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9, No. 3, 2008, p. 365.

^③ 徐邦文：《美丽的山国尼泊尔》，《人民日报》，1963年10月24日，第4版。

亚非各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与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凸显了两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共同立场与价值认同。^①

这种对中尼友谊的强调，甚至带有一定浪漫色彩的叙事，不仅体现在新闻报道中，也为同期更具学术性的尼泊尔研究奠定了基调。新中国最早的尼泊尔研究成果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在一些国情介绍的文章之外，多为探讨两国历史联系的论文。这一时期的中国尼泊尔研究者多为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与当时依靠田野调查展开研究的西方人类学家不同，他们主要依托中国历史文献，致力于建构中尼共有的过去。^②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更为综合全面的尼泊尔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例如，四川外国语学院于1973年完成翻译并出版《新编尼泊尔史》一书。^③197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篇幅约50页的小册子《尼泊尔》。^④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国家概况，该书依然沿用二十余年前的友谊话语，例如以一首将喜马拉雅山比喻为中尼友谊象征的诗作结尾。直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才出版体量更大的尼泊尔综合性百科著作《高山王国尼泊尔》。^⑤30年后，2010年由王宏纬主编的新版《尼泊尔》作为《列国志》丛书的其中一部出版，成为当下中国关于尼泊尔最为详尽的综合性百科介绍。^⑥

王宏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是国内尼泊尔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某种意义上，他的学术轨迹折射出新中国尼泊尔研究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从印度研究中派生出来，并受到冷战时期中美地缘竞争的驱动。根据他在访谈^⑦及撰写的纪念季

① 普尔纳·巴哈杜尔：《尼泊尔人民向中国人民问好》，《人民日报》，1956年7月17日，第5版。

② 例如，黄盛璋：《中国和尼泊尔的传统深厚的友谊》，《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0日，第4版；黄盛璋：《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5日；黄盛璋：《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阴法鲁：《中国和尼泊尔人民的传统友谊》，《人民日报》，1956年8月4日，第6版；陈翰笙：《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

③ 参见：邱永辉、曾浩：《21世纪以来中国的南亚研究——邱永辉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5年第3期，第130页。

④ 宁斯棣：《尼泊尔》，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⑤ 王宏纬：《高山王国尼泊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⑥ 王宏纬：《尼泊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⑦ 朱梅：《半生南亚缘：访尼泊尔研究专家王宏纬》，凤凰网，2015年2月9日，https://news.ifeng.com/a/20150209/43136880_0.shtml。

羡林先生的文章^①中所述，20世纪50年代，王宏纬在北京大学学习印地语文学，1963年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赴尼泊尔，参加尼泊尔国家文学会议，成为早期少数访问尼泊尔的中国学者之一。此后，他以此次访问为契机，于1963年与1965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两篇带有游记性质的文章，^②强调中尼在反殖民、反帝斗争中的共同历史经验与友好情谊。但他对尼泊尔的系统性研究，直至1978年加入由季羡林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后才正式开始。据他回忆，他原本希望从事印度问题研究，但因曾访问尼泊尔而被季羡林先生劝说投身当时几乎无人涉足的尼泊尔研究领域。此后，他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冷战时期中美对抗的国际政治语境。1984年，美国尼泊尔问题专家利奥·罗斯（Leo Rose）邀请他为《亚洲调查》（*Asian Survey*）撰写论文。王宏纬将这一邀请视为一次重要的学术交流机会，同时也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尼泊尔研究水平的某种“试探”。1985年，他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尼关系的论文^③在《亚洲调查》正式发表，成为新中国首位以英文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尼泊尔研究成果的学者。

（四）新时代尼泊尔研究的反思与转型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泊尔研究迎来了一个反思与转型的时期。尽管尼泊尔研究的学者整体上仍以欧洲和北美为主，但全球学界已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并避免欧洲中心主义视角，^④努力将尼泊尔置于更为广阔的全球语境以及多元的议题中加以考察。对于现代尼泊尔研究中所蕴含的殖民性，西方学界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自我反思。法国人类学家热拉尔·托芬（Gérard Toffin）在回顾法国人类学进入尼泊尔的50年历程时，对那个时代西方学者所承载的东方主义包袱作出了极具洞见的总结：“对这些人类学家而言，尼泊尔喜马拉雅地区是一个非

^① 王宏纬：《季先生鼓励、提携和指导我从事尼泊尔研究》，王邦维主编：《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阳光出版社2013年版。

^② 王宏纬：《尼中友谊之家》，《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5日，第4版；王宏纬：《山城处处是友情——游尼泊尔古城帕坦小记》，《光明日报》，1965年4月3日，第5版。

^③ Hongwei Wang, “Sino-Nepal Relations in the 1980s”, *Asian Survey*, Vol. 25, 1985, p. 512.

^④ Mukta S. Tamang, Suresh Dhakal and Janak Rai, “Nepal School of Anthropology: Emerging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B. Pokharel, J. Rai and M. Tamang, eds., *Nepali Anthropology: New Direction and Contributions*, Kathmandu: Central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ribhuvan University, 2016, p. 117.

凡的实验室……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尼泊尔是某些在印度和中国西藏已然消亡的古老社会—宗教形态的庇护所，而这些形态在喜马拉雅山中以其自身的方式延续和演变。这一喜马拉雅区域被视为一个边缘空间、一个边界地带、一个‘夹缝地带’，处于南亚文明与北方的中国藏族文化区域的交会处。”^①

托芬进一步指出，这种东方主义的包袱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障碍”，使研究者忽视了尼泊尔经验中“权力的连续操控、语境化的情境以及历史性的变迁”。^②此类反思表明，部分西方学者已意识到必须对尼泊尔在当代全球语境中的再现与理解进行重估，探索如何最小化尼泊尔研究中的“原罪”，并尝试发展新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以重新界定学术研究的领域边界与社会—地理空间的内涵。

在中国，当代尼泊尔研究的知识生产呈现出从政治宣传导向向政策性知识的转变。虽然此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尼泊尔研究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由宏观和国家安全逻辑主导的研究框架，多以中国自身为分析的出发点与目标，尼泊尔多被定位为国际政治或地缘博弈中的“变量”或“他者”，尼泊尔作为知识主体的能动性与多样性无法得到充分呈现。从另一角度而言，上面分析的中国尼泊尔研究的发展历程揭示出其知识生产始终与国家关切高度耦合。但这种以工具理性与战略思维为主导研究尼泊尔的方式无法满足当下建设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国家关切。基于此，中国学者也逐渐开始探索新时代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路径。

在这两股反思思潮的共同作用下，尼泊尔研究在西方和中国都迎来了转型。例如，在研究对象上，虽然喜马拉雅山地族群（如夏尔巴人）仍然是研究的重点关注之一，但研究视角出现了更具对话性和批判性的转变。例如，文卡妮·亚当斯（Vincanne Adams）在关于夏尔巴人的研究中，剖析了西方想象所建构的“虚拟”夏尔巴身份，并批判性地揭示了西方人类学长期存在的、对某种“真实的他者空间”的渴望——这一空间被设定为超越西方日常生活经验的异域场所。^③与此

^① Gérard Toffin, “Fields and Writings: Fifty Years of French Anthropology in Nepal”, *Studies in Nepali History and Society*, Vol. 14, 2009, pp. 272-273.

^② Ibid., p. 293.

^③ Vincanne Adams, *Tigers of the Snow and Other Virtual Sherpas: An Ethnography of Himalayan Encount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同时，雪莉·奥特纳（Sherry Ortner）也指出了夏尔巴人表征中所隐含的主导性权力关系。但与亚当斯不同，奥特纳提出了“严肃游戏”的理论框架，旨在“一方面解构殖民官式表征所承载的东方主义意涵……另一方面则通过民族志的方法建立夏尔巴人自身的主体性视角”。在奥特纳的框架中，话语与行动被视为共同构成个体经验与历史过程的核心要素：“……人类的经验从来不仅仅是‘话语’，也不仅仅是‘行为’，而是图像与实践、观念与行动密不可分的交织体；其中，历史塑造了人及其所参与的‘游戏’，而人们亦通过践行、再生产与改造这些游戏来创造历史。”^①这种反思性与方法论上的转向，标志着部分西方学者开始尝试突破传统尼泊尔研究中的殖民叙事模式，为构建更具主体性与情境敏感度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能性。

此外，一些学者成功地将尼泊尔研究的重心从乡村与山区转向城市，从而将奥特纳提出的“严肃游戏”场域延伸至加德满都及其连接的全球流动网络。例如，马克·利克蒂（Mark Liechty）跳出了传统的人类学种姓研究视角，转而考察城市尼泊尔社会，指出“阶级”已成为塑造国家首都生活的重要新变量。^②在“阶级与城市文化”这一总体框架下，利克蒂（2010）对以加德满都为中心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涵盖中产阶级文化、青年文化、媒介史、消费史，以及尼泊尔旅游发展史的跨国维度等议题，揭示了尼泊尔社会在全球社会经济动态中的表现与位置。^③在旅游研究方面，利克蒂的文化民族志展示了尼泊尔旅游业如何在神智学者、嬉皮士、国家政府、本土商人等多方力量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与演变。^④与此相呼应，希瑟·欣德曼（Heather Hindman）等学者通过研究加德满都的外籍人士文化，探讨了尼泊尔在全球化进程中与跨国流动体系之间的不平衡关系。^⑤上述

^① Sherry Ortner, *Life and Death on Mt. Everest: Sherpas and Himalayan Mountaineer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1-24.

^② Mark Liechty, *Suitably Modern: Making Middle-class Culture in a New Consumer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Mark Liechty, *Out there in Kathmandu: Modernity on the Global Periphery*, Kathmandu: Martin Chautari, 2010.

^④ Mark Liechty, *Far Out: Countercultural Seekers and the Tourist Encounter in Nep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⑤ Heather Hindman, *Mediating the Global: Experiencing Forms and Consequences in Kathmandu*,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Heather Hindman, “The Everyday Life of American Development in Nepal”, *Studies in Nepali History and Society*, Vol. 7, 2002, pp. 99-136.

研究只是该领域成果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多学科学者，围绕尼泊尔国内政治、种姓运动、发展、文学、移民与离散人群、性别、基础设施等议题，力图在分析尼泊尔社会内部多层次现实的同时，平衡多重联系网络中尼泊尔主体性的建构与重构。

近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中国的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在本土理论建构探索与海外民族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研究理论与方法探索上，一批学者对尼泊尔及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历史及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成果之一便是揭示其根深蒂固的殖民性，并明确将去殖民作为本土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知识谱系梳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也尝试进行本土理论构建，探索及重新审视“跨喜马拉雅”^①“环喜马拉雅”等核心概念，为更为细化和系统的研究打下基础。例如，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郁丹教授主持的研究提出突破传统地缘政治和区域研究静态视角的理论方案，将“环喜马拉雅”界定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性的地理空间，通过历史、政治及社会情境化方法揭示区域形塑的机制与过程，并通过追踪不同人、物品、资本和政治力量的跨界流动及限制，致力于展现喜马拉雅区域在历史与现实张力中的流动与制约。^②除了基础研究理论框架探索外，更多的学者尝试面向中国自身的经济或发展关切，将能源共同体^③、水电开发^④、跨境贸易通道^⑤等具体议题纳入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框架之中进行讨论。

在基础性理论或具体议题探索之外，一些中国学者在尼泊尔开展长期田野调查，撰写海外民族志，为长期由历史研究与政策分析主导的中国尼泊尔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除了关注西方学者长期聚焦的喜马拉雅山区族群、社会与文化^⑥，这些海外民族志更多涉及与中国

① 朱源帅：《迈向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一种理论尝试》，《南亚研究季刊》，2024年第3期。

② 郁丹：《序言——环喜马拉雅环境、生计和文化的连贯性》，郁丹等主编：《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一：环境、生计与文化》，学苑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③ 朱雄关、王刘怡：《新冠肺炎疫情下跨喜马拉雅能源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南亚研究季刊》，2022年第1期。

④ 许肖阳：《双碳目标下中国（西藏）尼泊尔跨喜马拉雅水电开发合作研究》，《西藏发展论坛》，2021年第6期。

⑤ 吴仕海、阎建忠、张镱锂、彭婷、苏康传：《喜马拉雅地区传统贸易通道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地理学报》，2021年第9期。

⑥ 例如，叶拉太：《变迁与承续：喜马拉雅中部洛沃的区域宗教史研究——基于尼泊尔西北部洛沃（木斯塘）的实地考察》，《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达瓦次仁、德丹旺姆：《初探尼泊尔境内粟米（人）的历史》，《西藏研究》，2023年第2期。

密切相关的现实议题，例如中国在尼旅游对尼泊尔本土旅游空间的塑造^①和中尼跨境器物流通^②等。它们以现实关切为导向，关注当下中尼交往过程中的日常空间，尝试去理解具体人群的在地互动以及背后的动机与机制。除此之外，跨境民族志的方法探索，^③以及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互补关系的学理建设，^④也进入学界视野。

（五）从中国 / 尼泊尔到中国—尼泊尔

总体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尼泊尔研究的主体性被消融在一种混合且模糊的学术范式中。这一范式既是现实地理的学术映射与再想象，也是学科边界不稳定性的体现。从当下视角观察，这类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族方法论的局限，将尼泊尔置于更为复杂、多层次的结构变迁中加以考察。然而，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尼泊尔作为知识对象的“去历史化”和“去主体化”倾向。一方面，尼泊尔常被塑造成全球力量流动的被动接受者或实验场，忽视了其内部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历史经验与文化能动性；另一方面，学术话语中过度强调区域互联性与跨国互动，反而掩盖了尼泊尔作为行动主体的战略抉择与历史主动性。

自 20 世纪末以来，尼泊尔研究中蕴含的自身殖民性和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凝视得到了较深的反思。然而，这种修正式的反思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知识生产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从研究兴趣以及议题而言，尼泊尔并未彻底失宠，不少学者仍然在从事相关研究，并且新的研究话题与方向也在不断推出。然而，不同学科间壁垒高筑，对于各自学科“理论意义”的关切导致虽然学者们都以尼泊尔为土壤进行研究，但彼此之间的交流却不甚通畅。因此，这些有关尼泊尔的学术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历史、社会或文化的复杂性或对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所能提供的参考性，而更多在于能否为西方学术范式提供

^① 李静玮：《市场中的民族与国家：论加德满都游客区的族性动力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 李静玮：《木头变黄金：尼泊尔菩提的跨国流动》，《民俗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③ 沈海梅：《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书写理论与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④ 沈海梅：《喜马拉雅生态—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兼论云南梅里藏区区域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7 期。

理论佐证，而非出于对在地知识或实践经验的真正关切。尼泊尔研究的理论意义，往往需要通过西方学科的逻辑与标准进行“认证”，而非以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进行评价。这种状况极大地遮蔽了包括尼泊尔在内的非西方主体在全球知识体系中潜在的建构能力。

作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并助力中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当下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自主化探索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解构长期主导该区域知识生产的殖民性认知范式；二是重构以区域为基础，以互动为逻辑的主体间性框架。近年来，中国的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在理论视野拓展、议题多元化与方法创新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在落实上述双重使命时，仍面临显著的结构性制约与实践困境。

首先，对殖民性与东方主义的批判虽在话语层面屡被强调，但常流于表层化、口号化。一方面，这类批判往往固守“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缺乏对殖民权力机制与知识建构深层逻辑的细致分析，表现为机械化地指称中国学界缺乏参与^①或“缺乏对学术脉络的了解”^②，在强调自主性的同时，限制了中国学界参与区域乃至全球学术革新的潜力；另一方面，不少研究在宣称去殖民的同时，依旧高度依赖西方学术标准与范式，甚至不加批判地推崇西方理论资源，陷入“批判殖民性”却实际“复写殖民性”的悖论。例如，将喜马拉雅区域视为“拉链缝合地带”的概念，^③实则重申了已饱受批评的西方人类学对喜马拉雅的本质化、去历史化与去政治化构建；再如，有学者在评价海门多夫对夏尔巴人研究时^④，将其视为尼泊尔人类学“现代化”的起点，既抹去了尼泊尔本土知识传统的历史连续性及不可替代性，也再次确立了西方学者在知识生产中的“奠基者”地位。此类叙述不仅延续了殖民话语塑造的学术等级结构，也偏离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平等主体视野。

① 沈海梅：《跨喜马拉雅合作民族志书写理论与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63页。

② 刘秧、徐君：《从“雪的住所”到“拉链缝合区域”：喜马拉雅地理概念、区域范围与人文特点探讨》，《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第86页。

③ 刘秧、徐君：《从“雪的住所”到“拉链缝合区域”：喜马拉雅地理概念、区域范围与人文特点探讨》，《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6期，第89页。

④ 赵勇：《海门道夫的尼泊尔夏尔巴人研究及其评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65页。

其次，当下研究项目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整合，不同学者之间议题割裂，难以形成区域性共同关切及议题。更重要的是，许多研究依然将中尼关系或中国视角作为分析起点及目的，几乎未触及尼泊尔本土学界关注的移民、离散、语言、政治、国族建构、文学、发展等议题。这种“中国联系”固然有现实意义，在发展初期能提供较大的研究便利，但中国学者如果缺乏自我反思，容易滑向将尼泊尔简化为中国相关议题的背景板，从而无法捕捉其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与历史能动性。

受制于这些制约与困境，虽然相关知识体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自主性对于中尼双边、亚洲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潜在作用没能得到充分释放。虽然一些研究尝试揭示与中国、尼泊尔及其他喜马拉雅区域成员相关的若干议题之间的现实联系，以及在时间尺度上呈现历史交往与当下关切之间的关联，^①但这些研究往往仍然停留在对“中国 / 尼泊尔关系”的分列式观察，即将中国与尼泊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将其内部发展逻辑或外部互动分开，而未能真正进入到二者之间“中国—尼泊尔关系”的交互式研究框架；前者往往呈现出单向度的解释或静态的知识生产；而后者则强调关系性视角，关注两国之间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与共建，从而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更具创造力和对话性的空间。正是这种“从并列到关联”的范式转向，才可能释放尼泊尔与喜马拉雅研究在去殖民、范式重建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价值。

三、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具体路径

在当下范式革新的过程中，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是：我们

^① Zezhou Yang, “An Experiment in New Nepali Studies: Decolonisation, Transculturation, and Everyday Life Between (and Beyond) Nepal and China”, SOAS, Ph D. Dissertation, 2024 ; Jingwei Li, “‘Guru Rinpoche is Śivajī’: Ethnicity and Ethnic Boundary Drift in Nepal’s Ethnic Art”, *Ethnicities*, Vol. 24, No. 3, 2023, p. 470; 李静玮：《时间制度与权力结构：以加德满都泰美尔区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当增吉：《全球化与地方性：喜马拉雅地区藏传佛教器物的流通与制作——以尼泊尔鎏金铜佛制造业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尕藏杰：《藏传佛教寺院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盆地的建立与发展——以博达纳佛塔周围寺院为例》，《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张辉：《族群传统与社会适应——尼泊尔海外藏人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5期。

为何要做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若无法确立这一知识建构的原点，就难以形成自主的问题意识，也难以摆脱“他者研究”或“服务现实”的学术逻辑。从服务殖民统治到冷战需求，从呼应人类学学科发展要求到为国家安全关切提供智力支持，上文揭示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不同的参与者而言，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有着不同的意义，其背后也有着不同的研究议程，这些为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原动力，其变化与多样性也为“为何要做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提供着不同的答案。

当下，致力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应在植根主体实践的同时，提出能够与区域及全球理论对话的新问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将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历史位置、地缘经验与知识诉求，转化为生成新理论、回应新议题的动力源泉。因此，推进尼泊尔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自主化，不仅是拓展区域研究的一个分支，更是重新定义“我们如何理解亚洲”与“亚洲之间如何对话”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尼泊尔研究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更是通向多极世界知识结构转型的重要通道。

从宏观层面来说，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应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作为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侧的近邻，中国与尼泊尔山水相连，世代友好，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近年来，两国在各领域加强务实合作，逐渐形成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并努力建设中尼命运共同体。作为知识生产以及多元互动场域的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应既是中尼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也要为其发展提供智识与理论支持。中尼命运共同体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不同层级和范围的共同体交叉融合，^②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的区域性实践。^③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应立足喜马拉雅区域，面向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把握世界大势与时代潮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相关研究应以求同存异、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页。

② 于洁茹：《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8期，第48页。

③ 陈雨萌、韩海涛：《习近平新时代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探究》，《观察与思考》，2021年第5期，第52页。

文明互鉴为导向，在扎根并尊重区域国情、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不囿于区域边界，放眼亚洲，为塑造亚洲责任感、时代观^①及跨时空链接打造以本土—区域—世界为逻辑链的理论和话语体系。

在此宏观目标的指引下，在中层研究议题设定层面，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应立足知识生产过程中亚洲学者的立场性（positionality），保持对尼泊尔、喜马拉雅区域以及其他亚洲地区和成员间的互动与往来的敏感性，同时关注那些宏大叙事之下的日常经验、琐碎交往与边缘叙事。这种依托于亲缘关系的立场，为中国尼泊尔研究者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开辟扎根于本土的替代性区域知识生产路径提供了可能起点，而这也正是本文所提出的“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核心理念。依托于文化与地缘亲近的新研究议题设定的提出，不应机械地以西方为参照，而应将中尼关系立足于亚洲内部的历史共生、社会互嵌与认知互鉴中，并据此关切发展自身的理论方向与分析框架。这样，包括尼泊尔研究在内的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才能在“后中心”^②时代真正参与有效对话，成为对话的主体者及知识共建者。

此外，在关注交流与联通的同时，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研究议题设定也强调应以批判和反省的视角关注此过程中的各类非链接（disconnection）^③时刻。如此做并不是要将这些时刻异化及问题化并寻找解决方式，而是要尊重并认识到差异以及非链接是喜马拉雅区域以及亚际互动中的有机部分。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强调在双向参照中把握多元主体性。如前文所述，在西方殖民学术框架下，尼泊尔往往被物化为被动的研究对象，其自身的重要性需要通过对西方学科理论的“贡献”来证明；而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有时也会不自觉地陷入此陷阱。为此，该范式主张既要深入理解尼泊尔和其他亚洲社会的自我定位、自身关切与权力结构，也要反思中国在历史与现实中与之互动的逻辑与话语生产机制。其次，这一方法主张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路径网络，同时也强调动态平衡区域

^① 福田康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亚洲的合作发展》，《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4期，第7页。

^② 汪晖：《作为时空体的区域》，《学海》，2022年第2期，第31页。

^③ Adhira Mangalagiri, *States of Disconnect: The China-India Literary Re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共性和国别社会差异。当前，中国的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在强调“区域主体性”时，有时会忽略不同国家、民族与社区的差异化诉求与不同的历史政治轨迹，导致分析结果过于同质化。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主张在区域结构与跨境跨学科网络的分析中，认识到尼泊尔作为独立政治与文化实体的独特性。这样既能把握其在区域网络中的联系性，也能避免将其淹没于泛化的叙事之中。

基于上述分析，在微观层面的研究方法与议题上，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应重视时空化的情境分析，要求研究者将互动过程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加以剖析。这意味着除了要探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宏观政策与地缘格局之外，更要关注微观层面的跨境实践与日常互动，例如商贸往来、宗教朝觐、移民流动及器物流通等。通过多维度交织的历史追溯与地理定位，研究者能够揭示跨境互动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避免单一国家主义视角下的单线叙事。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各类合作是当下中尼两国之间交往的主轴与动态热点。除了作为高维设计从政策层面指导两国在现实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从历史中为当下的地缘政治以及中国的周边外交源源不断地提供“地理文化”能量^①。但是，正如莫顿（Galen Murton）指出，中尼之间“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带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文件政策层面，也不囿于具体的合作项目，而是以多维度、多体积方式呈现（volumetric presence）^②在两国各层面的互动中。因此，对于中尼之间“一带一路”的理解与考察要摆脱二元、平面的制图想象，以立体的视角关注其在特定区域时空流动中的在地性。^③从方法论上，这要求我们不以宏观政策以及国家政府间合作为唯一关注，将选题视角覆盖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在地日常生活以及用“慢人类志”（slow ethnography）^④的研究方法理解“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落地以及影响。

此外，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主张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路径

① Tim Winter, “Geocultural Powe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eopolitics*, Vol. 26, No. 5, 2021, p. 1377.

② Galen Murton, “Beyond the BRI: The Volumetric Presence of China in Nepal”.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Vol. 12, No. 1, 2024, p. 73.

③ Chih Yuan Woon, “‘Provincialis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orising with Chinese Narratives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 62, 2021, p. 288.

④ Max Woodworth and Agnieszka Joniak-Luthi, “Exploring China’s Borderlands in An Era of BRI-induced Chang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61, 2020, p. 9.

网络，打破学科边界，融合包括但不限于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宗教学以及艺术史等不同学科，以此突破国家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在区域视角和全球视野下共同展开研究活动。^①该范式还坚持在全面深入准确捕捉在地及区域信息基础之上，推进批判性反思与理论生成并行。对西方殖民性与东方主义传统的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仅停留在批判本身而缺乏替代性框架，就容易流于口号化与二元对立。此外，理论生成也能突破具体在地情境，促进亚洲其他社会经验分享借鉴。需要注意的是，此研究范式不以将其转化为可与全球学术对话的分析概念与理论命题为终极目的，而是要为喜马拉雅区域其他地区研究以及亚洲不同跨地区研究提供某种程度上可参考的中矩理论。

总之，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不仅是研究技术路径的提出与系统化，更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下一种知识生产立场的自觉选择。它强调在中国经验与尼泊尔情境的交汇处，发现新的问题意识、生成新的理论工具，并推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从“被动追随”走向“平等对话”与“亚洲共建”。未来，随着更多中国学者深入尼泊尔实地田野调查、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并推动跨学科合作，中国—尼泊尔研究方法有望成为中国特色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重要范式支柱，不仅服务于学术自主化建设，也为亚洲区域和平与跨文明理解提供智力支持。

四、结语

围绕思考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这门历史悠久却深受殖民性荼毒的学科，如何能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积极参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重新焕发新生，本文提出的“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试图突破传统区域研究以“特征区域”为前提的研究路径，引入关系主义的理论思维，将关注点转向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区域生成与变迁过程中的互动与流动。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范式并非要营造一个理想化、真空化的交流场域，也不是简单地记录

^① 邱永辉、曾浩：《21世纪以来中国的南亚研究——邱永辉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5年第3期，第159页。

中尼互动中的人、事与物，而是意在将中尼关系的主体性生成与变动置于具体时空情境之中，并与微观层面的行动者及其行为结合加以考察。从具体研究路径而言，此新范式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将中尼关系立足于亚洲内部的历史共生、社会互嵌与认知互鉴中，并据此关切发展自身的理论方向与分析框架，平衡宏观议题和微观互动，并加以立体考察。

基于以上路径，“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的最大意义便是为不同维度的命运共同体内部以及跨维度交流与互鉴提供参考。虽然理论生成是其目标之一，但不同于传统欧洲中心主义那种将欧洲话语包装成“普适理论”，并以此异化或抹除非西方主体性的理论生产，该范式将理论的适用性扎根于具体的时空情境之中，强调互为借鉴的意义而非普世性。作为本土知识体系化探索的一种尝试，“中国—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虽然以中尼互动为切入点，却并不局限于双边关系。相反，它以双边关系为基础，将分析视野拓展至更广阔的区域与全球语境：一方面向内辐射至其他喜马拉雅区域，探讨跨国联系与区域性知识生产；另一方面，向外扩展至亚洲与全球南方，在不同层级之间横向与纵向交织互动，形成互相参照的认知局面。这样的方法不仅突破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单向度研究路径，更逐步形成从国家互动、区域联系到全球南方动态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自主知识体系。

这种联系既是系统内部的，也是跨系统的。在同一地理、政治、文化或宗教系统内部，类似的亲缘性与共享性为中尼关系范式所捕捉的经验及生产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提供了基础，可以被其他类似议题或情境所借鉴。例如，笔者利用上述“慢民族志”的研究分析方法对中尼之间的地缘政治动态进行日常、在地和对话性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基于在加德满都一家中国民宿的民族志研究揭示了日常旅游空间如何作为基础设施聚合体运作，通过诸如日常实践、空间重构与情感协商等方式，主动调节中尼之间的地缘关系。^①虽然此研究基于中尼互动的情境之下，但也可以在其他国别或者议题纬度加以借鉴。例如，以此为基础，相关研究可以考察中国—巴基斯坦互动关系情境下，民宿如何在日常互动中调节中巴地缘动态；或者中巴地缘局势是如何在其他类别的小型基础设施中被理解及协商的。

^① Zezhou Yang, “Guesthouses as Sites of Geopolitical Practice: Rethinking China-Nepal Relations Through Tourism”, *Geopolitics*, Vol. 31, 2025, pp.1-29.

在跨系统的层面上，亚洲和全球南方不同历史轨迹、制度逻辑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差异性，为跨区域文明交流与知识互鉴创造了空间。此外，亚洲和全球南方许多国家和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历史经验为文明互鉴创造了可能性。因此，由中尼双边命运共同体所产生的经验与理论可以被诸如“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等不同维度的命运共同体建构借鉴。同时，中尼命运共同体实践平台的构建也非单向的“输出—接受”模式，而应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双向乃至多向的互动。通过这种“在地经验—跨域借鉴—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中尼关系研究不仅能服务于双边合作，更能上升为推动亚洲乃至全球南方共同体建构的一个理论与实践支点。

[责任编辑：孙喜勤]